

## 香港有條件成爲漢英語言對比研究的中心

劉宓慶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

對比語言學是一門很有發展前途的新興語言學科。如果說歷史比較語言學是一種重歷時性、傾向於「厚古薄今」的語言學科，那麼對比語言學則適得其反，它是一種重共時性、傾向於「厚今薄古」的語言學科：探究「古」，是爲了闡發「今」。對比語言學是一門「朝前看」的發展科學。

在對比語言學中，漢英對比研究佔有特殊的地位。據聯合國八十年代末的統計，全球以英語爲母語的共計三億五千萬人，如果加上以英語爲工作語言的（分佈於六十個國家），則爲數達十四億二千萬人。<sup>1</sup>全世界以漢語爲母語的人共計多達十二億，佔世界人口總數近四分之一。漢語語言羣體集中於東亞，散居各大陸。漢語與日語、朝語、越語、蒙語關係極爲密切，如果加上操這些語言的人，則人數遠遠超過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見英語與漢語是全世界使用人數最多、文化影響最深、最廣的兩種語言。<sup>2</sup>

雙語對比研究是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所帶來的、無法迴避的任務。雙語接觸的程度愈深、範圍愈廣、雙語的差異愈大，則有待於對比研究解決的課題就愈多、愈複雜，就雙語進行系統對比研究的必要性也就愈突出。這種成正比的狀況與當代社會、現代科技資訊的發展又恰恰形成同步趨勢。據英、美、日不少機構報導，自九十年代末期起，亞洲將成爲世界經濟發展最有活力的地區，<sup>3</sup>國際經濟合作和生產力開發將集中在這個地區蓬勃展開。這個大的發展趨勢對漢英對比研究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從世界現代歷史來看，國際性經濟發展總是伴隨語言接觸同步地向前推進，並帶來許許多多言語交際中的問題和任務。例如六十年代歐洲共同市場的形成使歐洲各語種的接觸達到空前未有的規模和深度，致使歐洲共同體不得不在布魯塞爾設立研

---

1 參見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86.

2 同注 1。

3 參見 *1990 Asia Yearbook*, pp. 120-128.

究和督導語言交流的樞紐機構。1987年這方面的從業人員(包括對比語言研究、翻譯、翻譯研究和教學、雙語教學、辭典和各類工具書編纂等)的總人數已近四十萬。語言的對比研究是語際交流的各種業務活動領域中最基本的深層研究,可以說是一種「前沿信息工程」。

## 二

對比語言學研究語言的共同性( universals )和種種差異( disparities ),集中於語言的異質( heterology )問題。在總的研究方向指導下,每一對(或多種)特定語言之間的對比研究又各自具有其特殊的研究課題。上文已經提到,操漢英兩種語言的人全世界最多,但漢英雙語之間的差異又遠遠超過任何印歐語之間的差異。漢英各有其完全不同於對方的異質性。它們之間的差異有以下幾個大的方面:

### (一)語音系統的異質性

漢英雙語分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語音系統,除了大體相同的發聲學原理、音質特徵和音位分佈以外,漢英各自具有明顯的異質性。英語是拼音文字,語音學( phonetics )和音位學( phonology )所關注的是音系( sound system )的輔音質( contoid )、元音質( vocoid )、音節感( articulation )、音譜( phonetic notation )和音位區別性特徵以及音調—調核形式等等,顯示出鮮明的特徵。漢語用的是方塊字,基本上由沒有音符的「點」和「綫」(撇和捺是變體對角綫)所構成。漢語音韻學關注的是合聲反切、四聲韻系、聲況輕重以及現代漢語語音調型、拼綴、兒化等等問題。漢英語音發音既有大同又有大異,不知其大異則必然造成英不英、漢不漢的混雜語( hybrid )變態音。漢英語音對比研究是在發音和音位的大體共性的前提觀點下,進行審音、對音研究。這方面,我國古音韻學已樹立了許多範例。如梵漢對音(始於後漢三國)、朝漢對音(始於明清時期)、蒙漢對音(始於元代)和滿漢對音(始於清代,其中如莎彝尊著《正音切韻指掌》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等語音對比研究,對溝通雙語都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毫無疑問,漢英雙語語音對比的研究必將有利於提高我們的語音教學水平和質量,有利於提高傳譯教學和傳譯質量,也必將有利於我們制訂翻譯中的音譯規範、編制辭典中的發音、辨音指導原則,必將有利於提高文學翻譯(特別是詩詞中的韻律轉換)的質量。

### (二)文字系統的異質性

漢英文字系統異質性顯而易見。英語是拼音文字,具有屈折變化的形態發生學機制,這是英語的形式程式的物質基礎。漢字是方塊字,具有較強的形象性和意義的視覺分辨功能,是漢語語義結構的物質基礎。漢英文字系統對比研究無論從語義(雙語義素特徵和分佈模式)、語用(利用文字特徵構成修辭格等)、語法(英語以形態表示語

法範疇、漢語以詞匯表示語法範疇)等方面來說,都具有不可忽視的應用意義。文字系統對比還可以為雙語符號傳訊提供中介手段,為機譯提供「補償性語義傳遞」手段。

### (三)語法系統的異質性

文字的異質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語法的異質性。英語因為具有形態發生學機制,所以在各範疇(時態、語態、語氣、體、格、數、性、級)都具有穩定的、鮮明的結構形式,並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嚴謹的形式程式。英語的語法是「顯性的」(overt),語法與邏輯形式的統一性較強,語法歧義比較少。漢語不具備形態發生學機制,而廣泛使用詞的粘着和組合(以緊密度而論,組合強於粘着)來表示語法關係和功能,以語序和虛詞構成語法框架,很難形成穩定的封閉性系統(closed system)。漢語的語法是「隱性的」(covert)、非穩態的,語法與邏輯形式的統一性較弱,語法歧義較多,語法關係似乎「盡在不言之中」。在漢語中,邏輯上的及格句「太陽曬老頭」在語感上並不及格,語感上的及格句「老頭曬太陽」在邏輯上又屬於悖理。這樣就使漢語的語用功能成了語法功能的標尺,並使大量動詞的「主動性」和「被動性」模糊化了(如「曬」與「被曬」)。漢語的意合(parataxis)重於形合(hypotaxis),根源也在於漢語的形式弱勢。漢英雙語的異質性決定了英語嚴謹、規範,漢語流散、疏放的特色和不同的語言結構素質。掌握漢英不同的特色和結構素質對語言運用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無論對雙語教學、雙語教材編寫、辭典編纂、翻譯實務、翻譯教學和研究而言,或是對新聞採編和寫作、政務和商務公文編制以及對軟件開發、機譯、郵務電訊等等許多領域和行業而言,漢英對比研究都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和質量,擺脫雙語干擾所帶來的阻滯。

## 三

香港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條件,足以成為東亞乃至國際範圍內漢英對比研究的中心。

### (一)香港漢英雙語接觸歷史最悠久、範圍最廣闊。

香港在十九世紀初(清嘉慶十一年間)即有英國殖民者的活動。1845年香港出現第一張英文報紙《德臣西報》(China Mail),1862年出現英國的第一批能操漢語的翻譯人員(英國考選官學生,即cadet)。同年英人在香港開辦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漢英雙語接觸,至今已有近一百三十年的歷史。香港漢英雙語的接觸不僅歷史最久,而且範圍最廣、對社會的滲透最深。英語在香港屬於宗主國語言,具有特殊的交流地位,深入到政、商、學、警以及實業、宗教、財經、交通、社團和市井生活中,凌駕於「領地土語」(indigenous language)——漢語之上,成了「奪主之賓」,迫使漢語與之融合相處,而使今日之香港粵語,具有不少雙語

社會( diglossic society )的特色。從雙語交際發展的功利觀來看,未始不是一種積極現象。<sup>4</sup>六十年代以來,香港經濟突飛猛進,國外金融、商務、經貿駐港機構與日俱增,各種外籍專業人員大批湧入香港社會;同時,經濟躍升和商業繁榮又促進了香港旅遊業的發展,文化傾向多元化。這一切使香港成了漢英雙語接觸最密切和最豐富多采之地,可以為對比研究提供取之不竭的素材。

(二)香港地緣政治條件最優越,獨佔「地利」之美。

論地緣政治條件,香港對研究漢英語言對比可謂天下第一。

香港北靠廣袤的東亞大陸,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漢語生生發展之地。香港扼中國大陸南通天下之咽喉,學術上又不受大陸政治體制的掣肘,發展自由,沒有所謂「學術禁區」。香港實際上處於廣大的漢語語域的地理中心,東鄰臺灣,西近新加坡、馬來西亞,南及菲律賓和澳洲。由於香港是一個國際自由港,出入境手續方便,宜於進行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事實上,近年國際上許多涉及大陸、臺灣和世界各大國的活動都是在香港進行的。

(三)香港資訊技術先進,基礎雄厚。

香港無論資訊、技術、設備和人才、軟件諸方面都基礎雄厚,發展潛力也大。現代語言研究要求建立先進的資料庫,製備、儲備大量軟件。這方面,香港具有很大的優勢。目前香港共有大專院校三十七所,設有漢英語言科、系的即有十三所,共設置了二十多個雙語科系。其中不少單位已在(或在擬議中)設立語言資訊研究中心。譬如1991年度香港中文大學即已決定撥款四十五萬港元建立電腦化「香港英語資料庫」( Computer-based Corpus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in Hong Kong ),<sup>5</sup>中國語文研究單位則幾乎遍佈香港所有大專院校。

除了大專院校系統外,香港科技、商務系統也建立了不少資訊中心網絡,其先進程度達到八十年代末期的最新一代水平。這些設施都是我們進行語言對比研究所必備的技術條件。

(四)香港是漢英語言品種( variants )匯集之地,素材特別豐富多樣,可為漢英對比研究提供變態和常態的相對參照。

由於歷史淵源、地緣政治和國際經濟貿易格局等優越的前提條件,形成了香港語言分佈交融雜處的現狀。在漢語方面,香港本地語為粵語,同時又有不少居民使用國語、吳語、潮語、閩南語等等;英語方面,在香港作為官方語言使用的是英國英語,

---

4 這種現象在我國元代和清代都出現過。漢語中有許多蒙語和滿語詞匯都是當時傳入的。如把勢(《西遊記》,第三十二回)、團圓、大辣酥(《水滸傳》第二十四回)來自蒙語;櫛子(《紅樓夢》,第十一回)、孤隱來自滿語,我國唐代來自梵語的詞語更多,如劫波、和尚等等。

5 參見《中文大學校刊》,夏、秋期,頁3; *Chinese University Bulletin*, Sept./Aug., 1991, p. 4.

同時又有不少人使用美國英語、澳洲英語和南亞英語。語言品類之多之雜可以為對比研究提供不可多得而又不可或缺的相對參照。因為無論是漢語或是英語，都是世界上最複雜的語言，使用人數佔世界第一、二位，但使用者所遵循的語音規範、語法規範和慣例、語域規範、語義場界以及文化背景卻並不統一。這時的相對參照是至關重要的，捨此則我們的對比研究難免帶有片面性。從這一點來看，香港可以說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多語薈萃之地。

#### 四

迄今為止，西方語言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始於公元前約四世紀古印度語言學的研究，以巴尼尼( Panini )著《梵語語法》的問世為標誌，綿延達二千二百多年。這個時期的研究都是屬於語內研究( intralingual studies )，即各種語言(包括梵語、拉丁語、阿拉伯語；從十五世紀起出現印歐語各大語種的語內研究)「以本語種為本」的研究。第二個時期始於十八世紀末期的歷史比較語言學，以英國學者 W. Jones 和德國詩人 F. Van Schlegel 的比較語法論文為標誌，開始了近一個世紀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這是語言學史上第一次語際研究( interlingual studies )，以追溯和構建印歐語的「原始共同語」為共同的研究目的。第三個時期以索緒爾( F. De Saussure )的革命性研究為標誌，開始了從十九世紀初到現在的成果斐然的科學語言學時期。這個時期的語言學研究基本上是以語內研究為本，但語言學學科已廣泛關注語際的共性和差異問題，這就為第四個時期的對比語言學研究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綜上所述，語言學研究經歷了由分而合、由合而分又面臨由分而合的大趨勢。換言之，語言學總是從語內研究擴及到語際研究，又從較廣闊的語際領域中發掘更深入的語內研究的命題。這種語內－語際「相互作用」( interaction )的語言研究發展規律，正是語言學發展的大趨勢。

這個大趨勢在中國也不例外。我國古代語言研究始自公元前五世紀孔子的「正名」主張和公元前三世紀荀子「名無固宜」(《正名篇》)的主張，繼由《爾雅》(西漢初成書)、揚雄《方言》(西漢成書)、許慎《說文解字》(東漢成書)、劉勰《文心雕龍》(南朝齊末成書)等直到十九世紀末為古典漢語語言學語內研究時期。1896年馬建忠氏撰《馬氏文通》，意在語內分析，實際上是我國第一部漢語與印歐語之間的語際研究著作，馬氏的許多命題或結論實際上屬於雙語的參照性研究( referential observation )。《馬氏文通》通過雙語對比為漢語的語內研究提出了嶄新的課題，馬氏對這些課題的探討影響我國的語法界近一個世紀。現在已經到了用新的對比研究總結近一百年語內研究的成果的時候了。「從對比中鑑別，在鑑別中辨明」，我們需要在對比中更準確地認識英語，在對比中更深刻地認識漢語，為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為漢民族文明的發展構築「前沿信息工程」。香港可以在這項工作中作出十分出色的貢獻。